

城镇化与产业区域转移^{*}

陈甬军¹ 陈爱贞¹

(1.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趋缓的关键问题不再是体制因素而是经济因素,即是城镇尤其是东部地区城镇吸纳能力不足,使得人口迁移速度减慢从而导致城镇化发展速度趋缓。而制约城镇吸纳能力提高的关键是,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体系不完善而造成的就业结构升级进一步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以及产业规模与城市规模的非优化。城镇化与产业区域转移之间的互动关系表明,解决城镇化问题的落脚点应该是产业区域转移。但产业区域转移也存在诸多障碍,所以,应该通过一定对策来引导产业区域转移以推动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产业区域转移;产业集聚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2674(2004)12 - 0052 - 06

城镇化的本质是通过聚集效应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现代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必然会表现为农业剩余人口从劳动生产率低的传统的农业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非农业部门的职业转移,以及从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或从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的过程。城镇化的发展要以产业的发展为依托,但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投资规模偏大与产业效率低下,使得城镇吸纳能力不强,农业人口迁移速度趋缓。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指出,2004年主要工作重点为解决“三农”问题与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速城镇化(胡鞍钢,2004),据估算,我国现有约2.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据官方估计,目前中国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仍约有1400万人,要提供这么多的非农就业,又要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显然必须发挥产业的聚集效益。因此,目前城镇化已不能只强调人口的迁移,而应该注重区域范围和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区域转移,通过促进产业

集中、产业结构调整 and 就业结构升级,提高城镇的吸纳能力,从而带动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一、现阶段城镇化发展速度趋缓的因素分析:从体制制约到经济结构制约

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至少能带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同时,经济的发展又会进一步拉动城镇化发展。2002年我国东部11个省市占全国国土面积11.1%,集中了全国67.7%的GDP;占地71.5%的西部12个省市只集中了19.2%的GDP。可见,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是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重地,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部的经济发展及其吸纳能力。十几年来,由于生产力水平差距的悬殊,中西部劳动力大量往东部转移。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2000年跨省流动人口达4242万人,其主要的流出地是中西部地区,并主要流向东部地区,仅四川、安徽等6个省市就占跨省总流动人口的59.3%,广东、浙江等6个省市就吸纳了跨省总流动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3AJL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收稿日期:2004 - 10 - 10

作者简介:陈甬军(1954 -),男,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人口的 68.5%。但是, 比较于区域生产集中程度, 东部区域人口集中程度还是偏低, 只集中了 41.3% 的人口。对此, 有人认为是由于体制原因所致, 因而强调要排除相关的体制障碍, 以促进人口从中西部到东部的自由流动(李国平, 范红忠, 2003)。但实际上, 自 1984 年国务院颁布了允许农村人口迁移到附近的城镇和转移户口政策以来, 城市体制的改革已削弱了户

籍制度的作用, 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与城镇的就业机会成为农村剩余人口迁移的主动动力。从图 1 可见, 1994 年以来, 全国非农产业就业弹性系数降中有升, 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基本徘徊在 0 到 0.5 之间。因此不难判定, 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速度缓慢的关键原因是, 城镇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城镇吸纳能力的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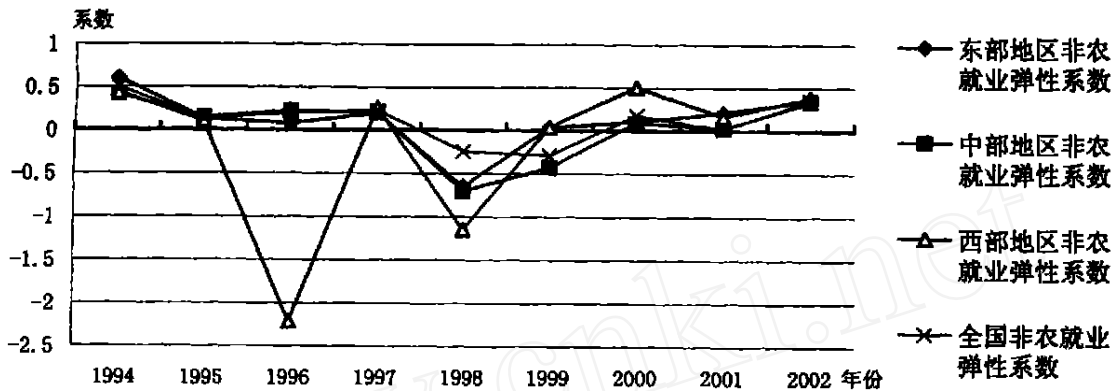


图 1 各地区非农产业就业弹性趋势

造成我国城镇吸纳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

1. 就业结构升级进一步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

现代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以产业结构变动为核心的经济成长模式。产业结构的变动同时会伴随就业结构的调整。城镇化是由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就业结构升级而实现的, 同时, 城镇化的发展引导劳动力在三次产业结构的流动也会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优化的趋势, 如表 1 所示,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从 1978 年的 28.1% 降低到 2002 年的 15.4%, 相应地, 非农产业产值比重提升了 12.7 个百分点, 同时非农就业比重也提升了 20.5 个百分点。但从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指标来看的话, 可以发现, 近几年就业结构的升级显著地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如表 2 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 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先升后降, 第二产业先降后升, 第三产业逐渐降低, 这说明第一产业的劳动密集度先有所降低但 1990 年起又开始上升, 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度先提高但 90 年代中期又开始下降, 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度一直上升。三次产业的劳动密集度综合表现为二元经济强度先降后又明显上升, 也就是说, 80 年代以来就业结构的升级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程度逐渐降低, 但是到 90 年代, 就业结构的升级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程度又逐渐增大。显然, 就业结构升级的滞后程度的增大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趋缓的关键因素。郭克沙

(2002) 通过研究认为, 由于改革前的片面重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过度农村工业化, 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滞后, 制约了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 导致了产值结构转变与就业结构的偏差。这确实是导致我国就业结构升级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原因。但是 90 年代之后导致就业结构的升级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调整又一次加剧, 与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体系不完善有很大关系。不合理的分工体系造成的产业结构的同构, 制约了城市间的经济往来联系, 资源被束缚在就业弹性低的区域, 使得发达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较为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不起来, 极大地影响了就业结构的提升。即使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雷同也相当严重, 凡是在地域空间上相邻的, 相似系数都在 0.93 以上, 有的城市间甚至达到了 0.98 以上(唐立国, 2002)。这样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相当普遍。

表 1 我国产业产值比重及产业就业比重 (单位: %)

年份	产业产值比重			产业就业比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28.1	48.2	23.7	70.5	17.3	12.2
1985	28.4	43.1	28.5	62.4	20.8	16.8
1990	27.1	41.6	31.3	60.1	21.4	18.5
1995	20.5	48.8	30.7	52.2	23.0	24.8
2002	15.4	51.1	33.5	50.0	21.4	28.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表2 我国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及二元经济强度

年份	比较劳动生产率			二元经济强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0.40	2.79	1.94	6.09
1985	0.46	2.07	1.70	4.14
1990	0.45	1.94	1.69	4.06
1995	0.39	2.12	1.24	4.26
2002	0.31	2.39	1.17	5.4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计算而得。

注: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各产业产值比重/就业比重

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2. 产业弱聚集效应导致城市规模不经济

很多研究表明,城市的效率与其规模成正比关系(Fujita et al, 1999; 王小鲁, 夏小林, 1999)。通过全国666个城市1989年到1994年及1996年数据的分析表明,10~1000万人规模区间的城市都有正的净规模收益,在100—400万人之间时城市的净规模收益最大(王小鲁, 夏小林, 1999)。由于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性。作为资源集聚

表3 2002年我国城市规模分布

规模	400万人以上	200—400万人	100—200万人	50—100万人	20—50万人	20万人以下
个数	10	23	138	279	171	3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城市的发展是以产业的发展为依托的,没有产业支持,无以提供充分的就业,也就无以吸引足够的人口,从而引致不了足够的有效需求,也就刺激不了城市的发展。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会产生明显的集聚效应,有利于集群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从而促进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Enright, 1990)。因而,城市规模的优化应立足于产业聚集基础上的产业规模的优化。在对Cobb—Douglas模型估算出的10个有显著的“最优”区域化效应的产业分析研究中发现,我国城市总体上还没有完全利用集聚经济效益,而一部分城市已经超过了同一产业地域集中的最优规模(潘佐红, 张帆, 2002)。可见,我国产业集中度低,大部分城市产业规模不经济,使得城市集聚效益差,吸纳劳动力能力弱;另一部分城市由于某些资源的过度集中,也影响了产业规模经济效应,造成了资源浪费。而造成产业集中度低的关键原因,还是出于本位主义的恶性竞争制约了区域间的资源自由流动,产业区域转移困难,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

综上所述,现阶段农业人口迁移的阻力已不再是体制因素,而是经济因素——城镇尤其是东部地区城镇吸纳能力的不足。制约城镇吸纳能力提高的关键

载体的城市,当吸引了一定规模的资源之后,城市所提供的各种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及形成的自行增长的市场力量,势必会吸引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向城市。因此,城市规模的增大往往带来吸纳能力的提升(Song, 2000)。王玫(2002)按不同规模城市在吸收非农业人口上的贡献大小进行了排序,发现除“文革”期间外,超大和特大城市吸收了最多的新增城市非农业人口,由于数量上的快速增加和平均规模的扩大,中等城市在提高城市化率方面也起着显著作用。但从1985年到1995年,尽管小城市数量增加很快,可由于其平均规模的变小,它们对城市化率的影响却是负的。从表3可见,我国规模大于100万人的城市只占城市总数的25.9%,规模小于50万人的占31.8%。另据199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表明,在全国16124个非县政府驻地镇当中,3万人以上的镇只有170个,占镇总数的1.05%;每个镇镇区平均总人口4520人。显然,我国城市与城镇规模总体水平偏小,而过小规模的城市聚集不起市场和服务的功能,也就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是,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体系不完善而造成的,就业结构升级进一步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以及低产业集中度影响产业规模并导致城市规模的不优化。

二、加速城镇化进程:基于城镇化与产业区域转移的互动关系分析

针对城镇化发展速度趋缓,郭克沙(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结构转变的趋势看,工业就业比重上升的空间已较小,因而主要应通过加快服务业发展来提升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而根据中国要素禀赋特性,有人认为中国应放弃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的追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延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命周期(林毅夫, 2002; 张炳申, 2002)。然而,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不同的阶段,如果要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减少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入,显然产业结构的停滞不前将成为这些地区发展的瓶颈因素,并将在由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丧失竞争优势。而那些如青海、宁夏等经济落后的地区,没有工业化为依托,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也只是无稽之谈。因此,解决城镇化问题的

落脚点应该是,通过产业区域转移,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及城市规模分布格局,以增强城镇的整体吸纳能力。

产业区域转移是由于区位优势 and 竞争优势的变化驱使某些产业从某一地区或国家转移到另一地区或国家的一种经济过程。城镇化的发展会促进产业在区域范围内转移,同时,产业的区域转移也会推动城镇化进程。

1. 城镇化与产业区域转移的互动发展机制分析

当某一或某些产业发展推动了城镇化的启动,产业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及因此而获得发展的各种基础设施、社会环境,会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向城市。人口的聚集会引致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地方产业部门的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包括消费者服务业)的联动发展。当产业的发展在区域内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企业,市场规模的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和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及信息和技术聚集与扩散效应,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促使特定产业或具有密切联系的相关产业的企业通过区域转移聚集到该区域。在产业聚集过程中,竞争的加剧会刺激企业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了产业分工的深化和产业链的延伸。当产业发展达到较高水平,会派生出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强烈要求,从而拉动服务业的发展。在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产业配套条件,将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转移过来。企业自主创新的传递、扩散会逐步推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并带来就业结构的提升。在这过程中,竞争引致的资源重新优化配置将驱使不具竞争优势的处在产业结构低端的产业从该区域转移出去,同时,会吸引具有竞争优势的处在产业结构高端的产业转移进来。产业和人口的高度聚集,将促进区域聚集发展,从而推动城镇化更快发展。

2. 城镇化与产业区域转移的互动发展过程分析

城镇化与产业区域转移是个不断互动、强化的发展过程。城镇化的发展会推动产业在区域范围内梯度转移。当城市聚集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活动总量,城市会以聚集效应引导工业向自身集中。工业在拉动城镇化的过程中,又在不断加强城市的聚集效应。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促进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实现城市空间上的扩展式发展。当城镇化达到一定高度后,一方面,地价的上升提高了区位成本从而使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另一方面,交通、运输、通讯的发达,又使产业的区域转移成为可能。因此,在比较成本利益的驱动下,用地面积大的工业开始产业转移过程。同时,

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又引致了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需求。人口和企业数量在城市的进一步聚集,原有服务业会出现短缺,并派生出对服务业新的更高的要求。当服务业的城市供给无法满足城市需求时,会内在地要求服务业的发展。当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城市聚集了一定规模的服务功能,就会吸引更多的金融、保险、文教等现代服务业向其转移聚集,并排挤工业向外转移。这样,第三产业聚集在高度发达的中心城市,第二产业向周边城市转移聚集,从而形成了具有一定层次性的城市圈。此时,作为增长极的中心城市,依托周边二级城市的工业化,主要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拉动城镇化的持续快速发展。周边的二级、三级城市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专业化发展来拉动城镇化的提高。

同时,城镇化的发展也会促进产业在全国范围内转移。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区域资源结构优势及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引起了城市间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为了回避经营风险和寻求利益最大化,空间转换成为占优选择,此时企业战略性的对外扩张构成了产业区域转移的主要形式。当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城市吸引了一定规模的生产要素,产业优势的进一步显现将吸引特定行业生产能力更大规模地向其转移聚集。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产业转移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层次也不断提升。

而产业的区域转移也会推动城镇化进程。对转出地来说,产业区域转移扩大了转出企业的市场空间,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强化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城镇化的微观主体,企业竞争能力的提升,实力的增强,无疑会促进当地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可利用产业区域转移的契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渐转移出产业结构高度水平低的产业,通过提升产业结构,推动城镇化更高层次的发展。经济落后地区,产业的迁入将增加产业生产能力及产业配套能力,产业的集中将提高当地产业的竞争力,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当转入地通过承接发达地区转移来的产业并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之后,原来适宜的产业也面临淘汰的境地,于是把不再适宜当地发展的产业转移到经济更落后的地区,承接从更发达地区转移来的更高层次的产业,随着不同结构高度产业的转入与转出,产业结构逐级上升,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

可见,城镇化与产业区域转移是个互动的过程,城镇化发展带来的产业分工格局与区位优势

重构会促进产业区域转移,而产业的区域转移带来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也将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三、产业区域转移的障碍分析

正如以上所分析的,如果产业能够根据区域的比较优势,在较大范围内以较大的规模进行区域转移,往往能推动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受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与体制等方面的制约,产业区域转移还存在诸多障碍。

1. 经济发展水平制约

产业区域转移是受经济发展带来区位优势 and 竞争优势的变化所驱使的。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绝大部分地区仍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产业,目前还不具备实行较大规模的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为目标的产业区域转移的现实性(陈建军,2002)。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区域转移多为如对外投资、对外设立生产加工点、设立市场营销点等初级形式,且规模都不大。产业区域转移的小规模和小范围及低层次限制了其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产业的区域转移是企业的市场行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引发的比较利益的基础之上的。经济落后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及投资“软环境”差,弱化了这些地区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的吸引力,从而削弱了其整体产业吸引力,使得经济发达地区欲转移的产业由于找不到有吸引力的去处而处在长期观望阶段,延缓了产业区域转移的进程。

2. 体制制约

一直以来,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是考核干部主要甚至唯一的指标。由于产业区域转移会造成转出地与转入地之间地区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因而,为保护当地 GDP 增长地方政府往往会使尽招数竭力挽留。比如,某地丧失了某产业优势,该产业有往外转移的驱动力,但所在地政府出于对当地配套企业或政绩的考虑,往往会通过减税甚至免税、土地无偿使用等各种优惠政策进行挽留,而欲转移企业在利益的诱惑下且考虑到沉淀成本就可能暂缓甚至放弃转移。

转移前:产业社会效益 $R = \text{企业效益 } R_e + \text{当地政府收益 } R_g(\text{税收} + \text{关联效益})$

转移后:产业社会效益 $R = \text{企业效益 } R'_e + \text{转入地政府收益 } R'_g(\text{税收} + \text{关联效益})$

企业转移是出于利益考虑的,因此一般情况下 $R'_e > R_e$;由于转移到更适合发展的空间,一般情况下企业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时也会带动相关产业更

好地发展,所以一般来说 $R'_g > R_g$,因而 $R' > R$,即产业区域转移可增加社会效益。虽然由于政府的优惠政策企业的短期利润增加了,但所增加的利润部分是从政府自己应得的收益中转移给企业的,因而,政府的行为造成社会资源的损失正好是产业区域转移所能增加的部分($R' - R$)。显然社会效益的损失会带来就业机会的减少。而且由于这种人为的因素,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地区由于无法尽快淘汰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就可能错失承接国际新一轮产业转移,加速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良好时机。而产业结构低度化的地区由于处于竞争弱势产业急剧衰退又没有新的产业支柱,城镇化发展缺乏工业化动力。

3. 转移成本制约

在城镇化进程中,东部地区受土地资源限制,势必会推动一些产业向中西部城市转移。然而,由于产业综合配套条件差,企业不得不另外支付的人力资本费、配套设施费等,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转移成本。

在乡镇企业发达的省区,为促进企业聚集,当地政府专门设立了工业园区或专业化园区。企业出于发展考虑也愿意搬迁,但由于进城、进园的门槛偏高,提高了搬迁成本。相比较而言,本地土地便宜,还能享受到一些土政策优惠,而且工人多为本村人,上下班方便,一旦搬迁要想挽留这些操作熟练的工人,必须要多支付交通等补贴费。成本一比较,企业搬迁的动力就下降了。

四、结论及其启示

产业相对集聚且环境适宜居住的东部,十几年来而且还将是中、西部地区农业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但在短期内,城市的规模与吸纳能力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因而,东迁的人口将有很大一部分要流向经济发达的小城镇。另一方面,目前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约有 2.7 亿,而且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及更多的人口将从农业中析出,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如果大部分都往东部迁,东部的承受能力将冲破其底限,而且迁移的成本(主要是流动人口定居所要提供的住房)是国力所难以承担的,因而,相当一部分人口要在中西部地区当地省内流动。因此,目前关键的是,在增强东部的城市与中心小城镇的吸纳能力的同时,还要增强中西部城市的吸纳能力。城镇化与产业区域转移之间的互动关系表明,应该通过促进产业区域转移,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以增强城镇的吸纳能力。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与地区利益的

矛盾,产业区域转移的规模与范围往往赶不上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应该尽快形成以市场导向为基础、政府积极引导的产业区域转移调节机制。根据现有情况,应分别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采取不同的对策重点:

1. 东部地区:整合区域资源,强化经济区域功能。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要进一步增强其经济活力,并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产业区域转移,应该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强化区域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明显的分工合作局面,以进一步提高区域竞争力。但因地方行政主体利益导向,目前还难以较好地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经济融合。因此,政府积极的政策导向还是很有必要:其一应淡化行政区划。应通过上一级政府出面协商,建立区域间资源共享、设施共建的协调机制,促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整合。此外,可根据经济发展需要,集中、撤并乡镇,或跨市、县进行行政重新区划。其二要建立严格的土地政策,严禁农地随意转为工业用地,以迫使大城市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产业选择,促进工业向外转移;并推动小城镇的工业向中心镇、城市集中。其三在发达地区,要制定鼓励高科技产业发展、限制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适当降低乡镇企业进城门槛,引导乡镇企业区域集中。

2. 中西部地区:通过重点培育几个具有现代经济中心功能的大城市,来提高整个区域的竞争力。由于中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实力弱,要同时推动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因此,应该重点培育几个经济增长极,通过增强这几个增长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集合能力,使其向外辐射能量,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最终提高整个区域的竞争力。为此,国家可在有较大增长潜力的区域如省会城市、主要交通枢纽城市和重要交通线沿线,集中投入资金、引入技术,培植主导产业部门,增强其吸引力和辐射力,使其能真正发挥要素的集散功能,吸引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此外,国家还可给予相应的政策倾斜,以吸引人才和资金向中西部流动。另外,还可发动各种社会力量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软环境”。

注 释:

东部 11 个省市指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西部 12 个省市指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其

余的 8 个省市为中部地区。

如果 30 年内要迁移 4.5 亿的非农就业人口,单是他们及其家属住房的建设费将为 4.2 兆元,即每年为 1400 亿元。详见盖尔·约翰逊:《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通过创造乡村非农就业岗位的方式来完成吗?》,载于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4 页。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2000 年流动人口 12107 万人中,省内流动占 65%,流入乡村的占 25.6%。

参考文献:

- [1]胡鞍钢. 城市化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J]. 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4,(3).
- [2]李国平、范红忠. 生产集中、人口分布与地区经济差异[J]. 经济研究,2003,(11).
- [3]“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 郭克沙执笔. 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2,(2).
- [4]唐立国.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产业结构的比较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02,(9).
- [5]王小鲁、夏小林. 优化城市规模 推动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1999,(9).
- [6]王玫. 中国工业和城市的地理分布:工业与城镇发展的协调性研究[M]. 载于陈甬军、陈爱民. 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 [7]潘佐红、张帆. 中国的城市生产率[M]. 载于陈甬军、陈爱民. 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 [8]林毅夫. 关于我国城市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几点看法[M]. 载于陈甬军、陈爱民. 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 [9]张炳申. 中小企业群集、城市化与就业扩张[J]. 经济学动态,2002,(12).
- [10]陈建军. 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略——理论和实证分析[M]. 中华书局,2002.
- [11]魏后凯. 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竞争力的影响[J]. 福建论坛,2003,(4).
- [12]Fujita,M.,Krugman,P.,Venables,A.J.,The Spatial Econom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
- [13]Song,S.,City size and urban unemployment:Evidence from China,World Economy & China,9(1),pp.46-53,2000.
- [14]Enright,M.,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0.

责任编辑:高冠中